京港清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秉　键　　王　禹

1993 年 10 月 5 日至 7 日，京港清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这次讨论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香港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京港地区数十名专家、学者和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三十余篇。会议期间，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清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问题展开了讨论，气氛热烈，内容丰富。现对会议集中讨论的一些问题，综述如下。

一、清代政治史诸问题

有清一代，历时二百六十七年，跨越四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政治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这次会议主要对清初的贪污、清代的历史地位和清宫疑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吕元骢(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清初的贪污》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清初的贪污情况及清政府的对策。他说，贪污与宗派活动、权力政治乃至种族主义密不可分，清政府的惩贪不但取决于皇帝的信心，而且受制于政治和军事气候。多尔衮摄政时，虽然对贪污表示不满，但因军务繁忙，无暇惩治。顺治亲政后，国内局势日趋稳定，他开始意识到贪污已对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颁布了一系列反贪政令，对满汉贪官予以严厉打击。鳌拜专权时期，清廷权力斗争激烈，为了赢得八旗王公的支持，他对贪污采取双重态度，即对汉族官员的贪污严加惩处，对满族官员的贪污表示宽容，因此惩贪效果欠佳。康熙亲政后，继续对贪污进行打击，主要措施是采取奖惩并施的方针，对清官大力表彰，对贪官严厉惩罚。尽管清初统治者的惩贪政策互有差异，但均将贪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为清代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张捷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在《清代惩贪》一文中，也阐述了清代惩贪政策的演变及其得失，颇有启发性。

王思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的《清前期的历史地位》一文，通过对明清之际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充分肯定了清前期的历史地位。他说，明清之际，西方殖民者接踵而至，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多民族国家，抗御外国殖民势力。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王朝是难于肩负起这一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外敌入侵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清代前期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同民族分裂分子和外国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清代社会经济走向繁荣，清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从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抵御了西方殖民侵略。

郭成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的《乾隆皇帝之谜》一文对乾隆的诞生地、生母和嗣位等问题进一步作了考证。他认为，乾隆诞生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由来已久，证据坚实，不容忽视，但若令人信服，还需驳倒“雍和宫说”的根据；而官书所载乾隆皇帝的生母是世宗孝圣皇后钮祜禄氏，在乾隆诞生地尚无定论时，应该被认为是信史。至于嗣位问题，他认为乾隆在康熙决

定帝位的继统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王鍾翰（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也围绕上述问题发表了看法。前者对乾隆在雍正继位过程中的作用表示怀疑；后者则主张乾隆的诞生地为“雍和宫说”。

王道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的《慈禧的家世问题》对慈禧的旗籍、家世和出生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慈禧生于北京，旗籍是镶蓝旗，不是镶黄旗，其父是官僚，不是平民。林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嘉庆皇帝的机遇》中，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嘉庆的继位、死亡等问题作了说明。

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文概述了甲午战争对东亚政治形势的影响。他说，甲午战争后，中国虽被挤出中、日、俄、英控制东亚的政治行列，但也从中寻到了发展的契机—三年后，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十六年后，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巨额的战争赔款，大力发展军国主义经济，积极推行扩张政策，最终在日俄战争中一举获胜，从而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后，由于列强在东亚的矛盾激化，从而出现了俄、德、法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日本的发展。

二、清代思想、文化史诸问题

清代思想文化，丰富多彩，这次会议主要对人口思想、学术思想和外交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胡绳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严复的人口观与救贫思想》中指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启蒙思想家，他在人口学、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提倡优生，反对早婚和近亲结婚。二，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观，并提出物质资料的增长与人口增长成反比的理论。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人口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三，认为人类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人口增长。因为教育可以消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流毒，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事业心。四，主张大量引进外资，筑路开矿。因此，他对清末护权运动提出批评，认为引进外资利大于弊，筑路开矿是救贫的关键。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近代儒学及其演变》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晚清儒学的发展特征。如，鸦片战争后，儒学作为考据学走向衰落，经学转而复苏，并成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政治运动的理论武器。再如，儒学虽与西学有矛盾，但在晚清出现了援西入儒现象；不少思想家为了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力图从儒学经书中寻找中西相通的依据。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的《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一文概述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和治学主张。她说，在清代中叶的学术界，钱大昕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以其在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乾嘉考据史学乃至清代汉学的杰出代表。其学术主张和治学途径，也集中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首先，钱大昕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反对师心自用，摒弃门户之见，力求“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种求真求实的思想与学术实践，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次，钱大昕治学十分强调考据，反对空发议论。再次，钱大昕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他不迷信古书陈说，在浩瀚的史书中稽古钩沉，积累了大量材料，然后加以归类排比，用以校勘史籍，印证史事，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就把传统的研究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接近或达到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

陈祖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在《阮元及其〈论语论仁论〉》中指出：“阮氏之所著，

以朴学释仁，原原本本，务实切己，于把握孔子仁学精要多所裨益。"他认为"仁学在中国历史上的演进，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使之成为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一个深层依据。""作为一种积极的经世学说，仁学终将同我们的民族、同我们了孙后代所生活的世界共存。"

王政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在《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一文中揭示了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改革的内在联系，并概括了清初实学思潮 和改革晚清戏剧文化的思想家、戏剧家的共同特征：一，他们都有一颗爱国之心，并具有远大的抱负。二，他们所面临的形势都具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特点。三，他们都经历过程度不同的坎坷乃至痛苦的过程。但是，他们都能以超越常人的目光和智慧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在同各种力量的较量中，他们不怕挫折，勇于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四，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五，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锐意改革，竭力唤起民众，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进而改造社会。

黄康显（香港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的《中国传统外交观念的转变》一文概述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的特点及转变过程。他认为，中国的外交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把外交关系视为人际关系，因此，不少清朝官员在外交谈判中往往以朋友方式对待对手。二是把外交视为单纯的商业活动，认为洋人来华只是为了赚钱。三是把外交等同于道德信义，主张以道德威慑洋人。四是把外交视为官方行动，反对民间交往。五是以天朝上国观念看待洋人，以离间、和亲为外交准则，不了解外国情势，不懂得国际法。尽管上述观念在清末有所变化，但微乎其微。

三、清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清代社会经济史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下述问题展开论述。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中国开始兴起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质的"义赈"活动。这一活动在性质上比起以往善堂的赈灾活动，有了很大的不同，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其一，它不仅把各地善堂联络、组织起来，而且广泛联系了某些新式企业如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甚至把中国驻外领使馆及企业的驻外商行也纳入自己联系的范围，从而形成了一个触角伸及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一些重要城市的规模巨大的义赈网络，因此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社会性。其二，它创造了一套新颖而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每当有重大灾情发生，义赈主持者们首先成立由社会名流领衔的义赈组织，然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统一印制募捐册，交由各地代理机构或联络点使用。待筹集到相当赈款后，即直接派人专程赴灾区散发，以免封建官僚机构插手干预，甚或从中侵渔。

秦宝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一文中将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笈结合起来，探讨了天地会的性质和起源。他说，从清代前期有关天地会的官书、档案及对洪门秘芨的分析来看，天地会乃是清中叶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而非明朝遗老等社会上层人物的政治组织。天地会是由乾隆年间福建高溪人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创，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

程恺礼（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师）的《十九世纪上海都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一文集中探究了十

九世纪上海市基础设施建设。她说，在十九世纪世界大都市的基础建设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对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视以及他们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与西方的一些主要都市一样，这种强制实施的公共医疗卫生制度不仅促使上海的市政当局得以诞生，而且还决定了其自身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在这一都市基础建设的进程中，上海的资本家、各类专业组织与宗教团体还很熟练、巧妙地将当时正在西方科学界、医疗卫生界流行的各种观念与措施、公共道德准则，以及市政组织等加以改造，引入其所处的独特的社会环境之中。所以说，正是此类带有开拓性质的奠定都市基础的工作，使得上海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得以迅速发展，并在该世纪末一跃而为仅次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国际性都市。

马汝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的《清代前期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一文回顾了清代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集中探讨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他说，从明清之际我国社会状况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清政府所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基本上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因而在客观上显示出它的积极作用：一、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二、增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三、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但是，清代民族政策也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性质，对此我们应有明确的认识。会上，王鍾翰教授不仅对清代民族问题发表了见解，还呼吁加强民族史研究。

李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在《清代商业》一文中概述了清代商业的发展情况及特点。他认为，清代商业与欧洲商业不同，前者是地方性的，其利润主要流向土地，后者是国家性的，其利润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前者一般采取独资形式和学徒制度，其经营特点是前店后场，后者则采取股份制和雇用劳动制度，其经营与工厂分离。

杨益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晚清的近代化问题》一文中指出，近代化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全面转化过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又加入了民族独立的成份。晚清近代化之所以没有战胜殖民地化，以致半殖民地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原因如下：一、晚清近代化运动不是主动推行的，而是在列强打击下被迫实施的，因此必然落后于时代之需，缺乏应有的活力。二，晚清近代化是由统治者直接主持、推行，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三，在晚清近代化过程中，“中体西用”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结果只能推行一些“皮毛新政”，没有抓住近代化的关键。

钱江（香港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巴达维亚的福建华侨》一文中追溯了福建人移居印尼的过程，详尽介绍了十七、十八世纪时，巴达维亚福建华侨人口的变化和职业构成以及他们的主要商业活动。从中得出结论，由于荷兰殖民者的东来和招引，明末清初时期的福建人在巴达维亚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华侨社会。这些寓居海外的福建华人不仅得不到清政府的保护，而且常常遭到荷兰殖民者的残酷迫害，在险恶的历史条件下，从事于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为中国与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商品交流，为印尼群岛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钱江先生的发言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会议其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戴逸教授、中国社科出版社副总编王俊义教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研究员等人亦即席发言，各抒己见，整个会议自始至终学术气氛十分浓厚。此次京港清史讨论会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香港大学历史系合办的第一次清史研讨会，也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学术会议。可以预言，京港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在今后会更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